

日本對最近匪情的批判

張棟材

從日本對最近匪情的批判觀察，日本對中國大陸的赤禍似已由隔岸觀火的利己心情走向重加檢討的覺醒境界。共匪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狂潮，使自始即受中國文化哺育而成文化支流的日本開始感到不安，這已不容其再有隔岸觀火的悠閒心情了。

一 前言

日本的報紙雜誌內容，本來在平時已是經常以共匪動態為其取材重點，自共匪發動了所謂「文化大革命」，尤其是「紅衛兵」登場後，則更是競相刊載有關此類報道評論，且尙繼之以增發專冊特輯，形成了匪情文字的泛濫。這類文字的來源大致有三種：一是日本各大報與通訊社派駐北平記者的電訊；二是日本各界訪匪者的見聞記錄；三是日本國內包括大學教授、作家、政論主筆等高級知識分子所提出的觀察意見。在過去，關於這類文字內容，總是或重或輕地含有同情共匪，甚至於公然偏袒共匪的居多；獨有這次却一反往常，幾乎是超大多數地對共匪的妄舉蠻行，作了嚴厲責問的批判。其何以會發生此一情況，當是由於下列幾種原因：

一、親匪的日本共產黨為適應其自身條件求擴大發展關係，在策略路線上打出「獨立自主」招牌而採取了突與共匪疏遠的態度，其機關報「赤旗」對共匪的一切完全處以冷眼旁觀的抹煞，因之，所有散佈在文化界屬於日共外圍勢力的左派文人，失去了撰寫為共匪張目文章的支持背景，於是就只好默不作聲。

二、蘇俄、東歐諸共產國家都對共匪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一致聲討，認為這是「與馬列主義無緣」的盲動幼稚病行爲。日本的另一派號稱「前進革新」的文人集團，固一向是以國際共黨的馬首是瞻，故亦唯有作附和的應聲虫，即內心存有異議者，其所能保留的程度，最多亦不過是對共匪之

所為表示困惑與疑念。

三、日本的部分有識之士，為日本前途設想，基於良知與危機感，乃在此時挺身而出，盡其口誅筆伐的責任。他們深明共匪的「紅衛兵」是一可能波及日本的亂源，其受日共、托派、社會黨幕後支配的「全學連」「長青團」「社青團」等青年學生組織，已早具備類似「紅衛兵」的同型性格，為求阻遏感染，日本識者便專門揭發共匪發動「紅衛兵」的醜惡與愚昧。

日本人因受日本報刊對共匪的報道評論影響，會積有若干重大錯覺，例如最顯著者如日本報刊自前年起將原稱共匪為「中共」的字樣亦都改稱為「中國」，這就首先造成使一般人誤認共匪已是代表中國的穩定而合法化政權的印象。所幸這次在日本報刊的匪情文字泛濫中，藉上述情況，使日本人却有了深入認識共匪政權暴戾本質與猙獰面貌的機會。

二 自民黨內部的看法

今年九月，共匪在導演「紅衛兵」運動中，仍按照其對日工作程序表，發出招待日本青年六百餘人至匪區進行所謂「交流」活動的邀請。共匪此舉開始於去年，其意圖所在，日本執政黨自民黨亦曾指出這是共匪對日本滲透顛覆的一項重要部署。但在去年自民黨並未能促使日政府堅決制止日本青年學生大批前往匪區接受「洗腦旅行」，今年的情形就不同了，「紅衛兵」的猖獗，使自民黨提高警覺而意見統一，最後是決定由法務省宣告拒發護照，這是繼八月初拒絕劉匪寧一等入境之後對共匪的又一次有力反擊。

自民黨內部雖對共匪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有兩派意見，可是能以作出上述決定對共匪施行抵制的一派，則是佔了內部的絕對多數，他們的看法多是認為此乃共匪弱點的自我暴露。如：

一、黨內亞洲問題研究會座長灘尾弘吉稱：「從其不得不以紅衛兵的暴力手段來維持國家秩序的一點來看，這已整個把毛澤東政權的弱點完全公之於世。」

二、前外相大平正芳指出：「紅衛兵自然是由上層主使操縱的，其是否能有功於毛澤東路線之加強，尙屬未知數。惟對毛政權而言，顯已露出其並非金城鐵壁的破綻。」

三、黨內外交調查會長，亦為自民黨副總裁之川島正次郎稱：「中共向世界大勢的逆方倒行，係由於對亞非外交受挫而發的反動，它對將來可能在中國大陸高漲的自由主義與和平共存主張，採取了先發制人的手段。」

四、前法相賀屋興宣稱：「此已為毛政權在對內外政策失敗、怨聲載道中最後之掙扎，紅衛兵因大眾無法反對雖可繼續推行，但此並不能鞏固毛政權，僅止於藉此作孤注一擲之賭博而已。」

自八月末至九月下旬會前往匪區訪問的前外相小坂善太郎等八名自民黨國會議員，在返國後所發表的言論固不免有為共匪辯護的成分，如謂共匪並非好戰；經濟情況好轉；自由世界亦有一半責任等，但這似是一種陪襯的技巧，其舉出的實例則是立論主體而能讓日本朝野有所領會。如小坂等稱：①所謂「文化大革命」和當年日本軍部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前後情景極其相似，愚昧可笑之處甚多；②在匪區毫無自由，共匪令彼等所看者只限於專供外人參觀之事物；③農村青年對紅衛兵不感興趣，城鄉待遇差別懸殊；④共匪僅告去年食糧生產為兩億噸，其他一切統計數字一概無從得知。

自民黨內「亞非問題研究會」的一些人，素有親共匪的色彩。其主要分子對共匪「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所表示的意見，如松村謙三稱：「紅衛兵運動在政府監督下，縱有過分之處，亦可立即獲得校正」；宇都宮德馬稱：「文化大革命是爲了建立準戰時體制，其最大原因爲美國施行圍堵中共政策所致」；川崎秀二稱：「對紅衛兵運動應視為中共力圖克服美蘇包圍的行動」，這都是強作有利於共匪的一種解釋方式，不過，他們畢竟也自知難以取得人的共鳴，故都同時加註了同一的結語：「對此項運動的暴力傾向，却

不能不加批判」。（見本年九月四日朝日新聞）

其他如在野黨社會黨、民社黨、公明黨亦均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社會黨認爲紅衛兵所代表的共匪動向與社會黨的和平革命路線大異其趣，將使向民衆呼籲與匪建交的宣傳遭遇困難；民社黨則直率地宣稱：「紅衛兵運動暴露了共產黨的本質」，用以抨擊社會黨盲從共匪的政策；其以宗教爲背景的公明黨，也指出了：「這是內涵矛盾的革命方式，以紅衛兵強迫不辨事理的少年跟着有所行動，這是有問題的」。

三 親身觀察者的描述

日本派駐北平的新聞記者共有九人，是外人記者在匪區中最多的。另一方面，日本人平均每年都有包括各界的五千人以上到匪區去，也是佔外人訪匪區的第一位。這次日本記者在報道紅衛兵消息上，因具有優於其他西人記者的條件，如藉其原有之漢文知識能讀通「大字報」的怪離內容；且能通過人事關係與「紅衛兵」舉行座談會直接採訪，故不僅是量最多，亦在質上有相當獨特的表現。

日本記者所發自北平的長短篇電報、電話通訊及照片，其特色是能寓批判精神於報道之內。他們以「紅衛兵旋風」的新用語來描述其親身見聞的實感，例如日本記者的服裝髮型，亦在北平街頭受到紅衛兵的干涉；日本記者在學校、醫院、住宅區見到紅衛兵動手吊人與辱人的情景；十月十日與紅衛兵座談會中直接由紅衛兵口中得知清華大學附中校長萬邦儒被虐待担任打掃便所等記述，對日本國內是一極大的精神衝擊。因此，日本記者以其真實客觀報道最能發揮批判共匪效果的，爲以下諸項：①紅衛兵的狂暴與無知；②毛匪澤東神話的非常識性；③共匪內部權力鬥爭的形勢；④紅衛兵與地方派系之對立；⑤毛匪之「世界革命」計劃與紅衛兵今後動向；⑥大陸人民日常生活縮影。

在最近前往大陸匪區訪問的日本人中，其較突出受人注目的是向以無黨派自由作家爲號召的大宅壯一、三鬼陽之助、大森實、秦豐、藤原弘達、小谷正一、梶山季之等七人，竟能自費到匪區親作考察旅行，帶回許多有助於使日人瞭解匪情的活資料。

大宅壯一係時事評論家，慣於以嬉笑怒罵態度作諷刺幽默論說，他在歸國後的第一篇時評文中寫出對共匪的觀察說：「十八天的旅行，歷經廣州、上海、無錫、南京、天津、北平、武漢等諸大都市，等於是在十八天中被逼着看了同樣的一個電影，不勝因倦與漫長之感。」他對毛匪、「文化大革命」、「紅衛兵」作出下列的診斷：

一、所謂「文化大革命」是既非革命，亦不似政變的一種在歷史上找不出同一類型的東西，這種利用幾百萬以至幾千萬青少年的怪作法，即使達成所預期的目的，却必須付出喪失國際信用的虧損。毛澤東不惜玩弄這種近似「兇戲革命」的手法，或即為已進入判斷力衰退的老年化現象之反映，傳聞中的毛患腦軟化症之說，不無可信之處。

二、「文化大革命」亦可稱之為「年齡革命」，在毛澤東心目中，凡屬四十歲以上之人，已均不能信任，因之乃有紅衛兵之出現。關於此點，可由大陸一般民衆對紅衛兵示威遊行時所表示之冷漠態度取得證明。紅衛兵的年青活力，恰適於高階層以其作有計劃性的「下剋上」使用。

三、今日之中國大陸，已使報刊絕跡，完全成爲大眾傳播的真空地帶。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一律只有毛澤東三字，索然無味，毫無閱讀之必要。在此種情形下，「大字報」乃得以大行其道，因其中在對人攻擊文字內多涉及男女間之私事，故能引人欲讀。

四、在共匪內部現有兩個對立而尚能保持均衡的勢力，任何一方似均難有壓倒性的強勢，苟一旦打破該項均衡，則兩者必有正面衝突，屆時共匪將陷於極大危機。紅衛兵之組成已預示其受主流派支配向打破均衡方向發展。三鬼陽之助爲日本財界研究所所長，他曾以「不買毛澤東公司的股票」爲題發表專文稱：「在此次旅行中，我會竭誠與中國的『民族資本家』晤談。可是，結果總難以如願，其拒絕的理由很簡單，說是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忙，正在努力學習中。」

「在我的想像中，那些被稱爲民族資本家的人們，目前定是正遭軟禁，受文化大革命思想的洗腦工作。最後必然是以自發自動的名義宣佈將他們的財產充公。我會將此一見解告訴中共的新聞記者，記者們却只是笑笑，既不承認，也不否定。」

三鬼將共匪譽爲一個公司說：「使我驚奇的是中共想將大陸塗成毛澤

東一色，這實在太危險了。譬如一個公司股份宣傳專捧自己公司的董事長，那你最好不要買它的股票」。

另一原係每日新聞外報部部長的大森實，他強調共匪對蘇俄的憎惡已超越過對美國的仇恨。小說作家梶山季之亦對此點表示同感說：「中共處於美蘇包圍中，爲求支配七億民衆聽從調遣，便深感有成立狂熱宗教的必要，這個宗教就是毛澤東思想。」梶山接着說共匪之紅衛兵運動或即係利用小孩子來壓服不願聽從調遣的成年人，「但成年人比小孩子心理複雜，詭計亦較多，紅衛兵未必能鬥得過。」

四 學人對共匪政權的剖析

日本報紙如「朝日」「每日」「讀賣」「產經」等在早、晚刊之外，尙輔以讀物週刊的發行，在此兩月來都是將共匪的「紅衛兵」作了寫作主題。假若從這類新聞性的報刊範圍轉至一些論文型的雜誌作一流覽，如「中央公論」「文藝春秋」「世界」「世界週報」「經濟學人」「經濟往來」「潮」等爲人所熟知的權威性定期刊物，在九、十月份內也是以大半篇幅登載了匪情論評。綜觀這些多爲學人執筆的論文，都着重於尋取新觀點對毛匪個人的精神狀態、學識、權力作剖析，從而預測其政治生命，以及匪偽政權的可能變化。

歸納起來，可有這些使日本謬者們感覺與往者迥然不同的意見：

一、匪黨內自大躍進失敗後，即已分裂爲毛澤東強硬派與反毛澤東之批判派，此次毛匪之採取紅衛兵暴力恐怖行動，係由於毛派自知在黨中央不佔多數優勢，蓋已置身於孤立中，遂以恐懼之心而行無所不用其極之事。

二、所謂「毛澤東思想」，在對生產力，生產關係問題上，却根本缺乏認識。毛匪之「矛盾論」「社會發展論」是使生產關係先行，然後再讓生產力去追趕生產關係，這是倒用社會發展的法則。

三、紅衛兵之出現，不啻暗示毛林體制所面臨之嚴重困難，毛澤東爲求消滅修正主義之威脅，已被迫不顧犧牲威信而選擇此一最後手段，惟紅衛兵與一舉推翻獨裁政權之暴力革命，有其密切相關聯之要素存在，今後亦能轉向爲打倒共產政權之民衆運動，使共匪政權發生提前到來之變化。

四、毛林體制尚在初步建立階段，前途阻礙甚多。毛澤東所最憂慮者爲其死後受到如史達林式之被鞭屍，故出以跡近瘋狂之全大陸整肅舉動。紅衛兵已與地方黨政組織控制下之工農學生呈對立狀態，且難以協調，勢必導致未來混亂之局。

五、「文化大革命」爲秦始皇焚書坑儒之現代版，此爲對現代挑戰之愚行。在中國大陸之知識份子已無發言權與生命保障，其但求苟生者如郭沫若等之自我批判，實爲知識份子之墮落。惟中國知識份子對權力之抵抗，亦有其獨得之方法，係在無形中成長。

六、毛澤東將作第二次大躍進之試驗，共匪在實施第三次五年計劃中爲求蓄積資本，自只有加緊降低國民生活水準，強制勞動生產之一途。現紅衛兵所叫出之口號及提出之要求，殆即爲毛之第二次大躍進之序曲。

此外，所能嗅到含有對共匪姑息氣味的論調，則是以「毛澤東試圖從事

史達林都未能做的人性改造工作」爲解脫毛匪愚暴行爲的論據，但也並不敢悍然表示要擁護這種改造工作。

五 結語

從日本對最近匪情的批判觀察，日本對中國大陸的赤禍似已由隔岸觀火的利己心情走向重加檢討的覺醒境界。共匪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狂潮，使自始即受中國文化哺育而成文化支流的日本開始感到不安，這已不容其再有隔岸觀火的悠閒心情了。

日本執政者在不留情日匪貿易上是否能保持不利令智昏的立場呢？這仍是一項疑問。日本知識份子對共匪企圖否定中國歷史的妄想已提出批判的抗議，但對於接受作爲如何維護東方文化戰士的任務，則尙在徬徨之中，這更是期待於日本知識份子良知抉擇的一項考驗。

偽

蒙

的

對

外

關

係

尹慶耀

偽蒙的對外政策，不決於庫倫，而決於莫斯科。一切須在有利於蘇俄之條件下進行。自由國家與偽

蒙建交，將直接提高此一附庸之國際地位，間接有助於蘇俄政策之推行。另一方面則減低本身之聲望，打擊反共國家之士氣。至於意圖在偽蒙獲得莫斯科命令許可範圍以外之任何事物，勢必成爲泡影。

外蒙地區是帝俄與蘇俄不斷垂涎的土地，偽蒙政權是蘇俄最早且最忠實的附庸。

一九二一年我辛亥革命時，外蒙即在帝俄唆使下宣佈自治。俄共十月革命後，屢次聲言放棄帝俄在華之一切特權。一九一八年七月，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G. V. Chicherin)對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報告稱：蘇俄政府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北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外交人民委員助理加拉罕(L. M. Karakhan)發

表宣言，明白表示蘇俄放棄其在蒙古的特權。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外蒙取消自治，重入祖國懷抱。一九二二年蘇俄紅軍進入庫倫，製造「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同年十一月即予承認。惟蘇俄一直不敢否認外蒙爲我領土。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解決懸案大綱」第五條明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爲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份，並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俄蒙簽「友好互助」議定書，我政府以其違背「中俄解決懸案大綱」，提出嚴重抗議，四月七日我外交部聲明該議定書無效。八日蘇俄復照聲明，無意損害中國之主權，一九二四年五月之協定繼續有效。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首腦雅爾達會議，在祕密協定中，蘇俄獲得